

基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中东研究 动态可视化分析

邵玉琢 罗林

内容提要 2008 ~ 2018 年 1 月, 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收录的 11 种中东研究领域刊物共刊发论文 3 139 篇。基于上述研究样本, 使用文献计量学工具软件 (CiteSpace) 对其分析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 我们可以看出: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东研究期刊论文的研究主题, 集中于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国别研究, 主要围绕政体、民主、身份等政治理论研究议题; 研究热点的时序变化, 不仅有以色列国家合法性、土耳其国民身份认同与威胁等现实问题研究, 也有反思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理论研究; 研究内容与观点存在着先天性不足和内生性缺陷, 即理论工具的选择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 价值取向也体现出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优越性, 带有明显的“西优东劣”的文化霸权思想和“改造”中东的强烈意愿; 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 且具有趋于程式化和同一性的特点。基于此, 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竞争中, 我们要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 既要理性认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本质, 也要选择地借鉴西方中东研究的可取之处, 以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

关键词 学术话语权 中东研究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文献计量学工具

作者简介 邵玉琢, 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83); 罗林,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中东学院院长、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83)。

当前,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中东而言亦如此。从国内中东学界现有研究状况看,学者对于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中东研究情况的评价,助力国内学界了解这些国家中东研究的议题、观点与方法等动向。这些综述类研究成果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文献占有的多寡和分析综合的水平,更有赖于学者自身的深厚学养和丰富的研究经历。由于分析工具的限制,综述类研究成果呈现出“所见即所得”的特点。而近些年,现代科学计量学的发展为大样本文献分析提供了高效的工具,也为探寻中东研究动态与趋势注入了新活力。

分析工具及研究样本的选取

本文拟借鉴科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 和信息可视化 (Data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技术,使用由华裔学者陈超美教授 (Chaomei Chen) 创制的文献计量学工具——“CiteSpace”软件^①,通过提取研究文献中的相关信息,如关键词、学科、领域分类等,采用定量统计分析和定性描述结合的方式,进而重构信息单元间的联系类型和强度,透视出西方学界中东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前沿、研究演进路径等。

对于研究文献的选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数据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②无疑是我们考察英、美等西方国家学界中东研究动态的重要窗口。这是因为,“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由美国研制与出版,共收录了 11 种中东研究期刊(参见表 1),除具有一定西方文化背景的土耳其出版了

^① “CiteSpace”软件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教授陈超美教授在 2004 年开发,它是一款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2009 年,大连理工大学将“CiteSpace”引入国内,其应用领域不局限于科技领域的引文分析,而且在政治学、文学、管理学、医学等学科中均有应用研究。该款软件至少被超过 60 个国家的用户上万次启用,已经成为科学计量学普遍采用的新工具。在中国,该软件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中国已经成为该软件全球访问量第一的国家。参见陈悦、陈超美、胡志刚、王贤文等:《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6 页。

^②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论文数据来源于美国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公司开发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网址为: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WOS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5BT46VqNpa1JCKgEjxR&preferencesSaved=, 2018-01-1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正文中所列论文数据源于该数据库,所有图和表为软件算法得出并已作汉化处理。

《土耳其的新视角》杂志以外，其他 10 种主办方均来自美国和英国。与此相对应，美国、土耳其、以色列、英国、德国、加拿大为中东研究论文第一作者分布最为集中的国家（参见图 1）。这种态势一方面体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国际学术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学界中东研究视点。

表 1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中东研究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出版周期	论文数量	主办方	语种
1	英国中东研究学刊 (The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季刊	256	英国	英语
2	国际中东研究学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季刊	249	美国	英语
3	伊朗研究 (Iranian Studies)	双月刊	380	英国	英语
4	以色列研究 (Israel Affairs)	季刊	359	英国	英语
5	中东妇女研究学刊 (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	三期/年	136	美国	英语
6	地中海政治 (Mediterranean Politics)	三期/年	220	英国	英语
7	中东学刊 (Middle East Journal)	季刊	201	美国	英语
8	中东政策 (Middle East Policy)	季刊	390	美国	英语
9	中东研究 (Middle Eastern Studies)	双月刊	493	英国	英语
10	土耳其的新视角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半年刊	118	土耳其	英语
11	土耳其研究 (Turkish Studies)	季刊	337	英国	英语

说明：刊名按首字母顺序排列；本数据只限于期刊论文，不包括会议论文、会议综述等其他文献类型；论文数量指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12 日刊载的论文。

基于此，本文选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内 11 种中东研究领域的学术期刊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12 日刊载的 3 139 篇论文。数据截取时段基于文献半衰期，一般社科类文献的半衰期为 8 至 10 年，因此数据截取时段选取为十年。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本文详细记录了图谱绘制的算法参数和优化方式，以便读者使用“CiteSpace”软件获取彩色矢量图进一步了解相关图谱包含论文的详细情况，由此以可视化空间知识图谱的形式直观地展现西方学者的中东研究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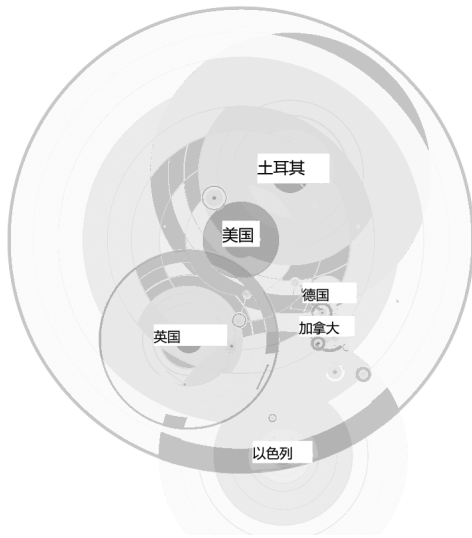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东研究论文第一作者国家分布图谱

研究议题与热点

中东研究期刊论文的研究热点随着中东地区形势变化而变化，在历时层面呈现出研究主题的变化，在共时层面呈现出不同国家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研究主题在学术期刊论文中则集中体现在“关键词”（keywords）当中，因为“关键词”是论文核心内容的提炼，也是一篇论文当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通过梳理分析论文当中的关键词，我们可以基本把握论文的整体面貌，对论文关键词进行空间引文分析，则能够发现关键词空间网络中的研究议题和研究热点。将时间切片定为一，采用“g-index”的提取算法（规模因子 $k=5$ ），使用寻径算法（path finder）对单个时间切片和复合时间切片剪裁后生成的论文关键词分布图谱（参见图2），共得到节点121个，节点间连线133条。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半径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节点年轮深浅不同代表出现该关键词论文发表的不同年份，年轮中心向周边年份逐渐递增。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不同关键词出现在同一篇论文中的共现关系，连线越粗共现关系越强，反之亦然。

由图2可以看出，中东研究期刊论文关注度最高的两类研究主题：国别研究和政治理论研究。由于中东地区特殊的政治格局和不同国家政体差异，

一文中指出,在以色列的苏联移民在政治取向和选举行为上与同龄的以色列人具有明显的差异,由于移民的苏联背景造成了对民主价值观态度的人口特征差异。苏联移民在以色列社会政治重新社会化 (political re-socialization) 的过程中,他们的价值观不会受到影响。虽然价值观有明显的延续倾向,但在对于以色列部分社会化 (socialized partly) 的苏联移民后代而言则倾向于民主的观点。加斯帕·鲁西 (Jaspal Rusi) 在《伊朗的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① 中认为,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是伊朗意识形态的两个重要基石。加斯帕通过分析社会心理动机,讨论了反犹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帮助伊斯兰世界恢复归属感与群体内外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波斯人维护什叶派穆斯林和霍梅尼思想的社会心理动机,以及犹太人和以色列对穆斯林群体延续性的威胁。

第二,移民问题是重要研究视点。来自苏联 (或俄罗斯) 的以色列移民颇受研究者受关注。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的差异使得俄罗斯移民更具特殊性:在意识形态上,来自苏联的以色列移民在接受民主价值观过程中存在障碍;在文化背景上,俄罗斯移民带有苏联或俄罗斯的文化特征。俄罗斯移民的特殊性体现在政治倾向和身份认同方面的差异,也是增强移民对以色列国民身份认同中的障碍。勒纳·茱莉亚 (Lerner Julia) 在《作为解体后苏联时期的主体——在以色列的俄罗斯人:文明保留者》^② 一文中,通过考察当年生活在以色列的俄罗斯人的社会行为来理解极端集体社会文化的异质性,在关键文化 (key cultural) 和社会学范畴内将“俄罗斯性”进行解构,讨论知识分子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俄以交流中的影响。尼兹尼克·玛瑞纳 (Niznik Marina) 在其撰写的《以色列“俄罗斯青年”的文化习俗和偏好》^③ 一文中,把青年群体作为研究重点,通过问卷和深度访谈方法研究了16至24岁之间的俄罗斯移民,剖析了俄罗斯青年与以色列文化融合的非线性特征,以及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年轻人选择保留俄罗斯文化身份的原因所在。他否定了学习希伯来语的困难造成俄罗斯青年移民文化融合障碍的假设。这种采取按年龄

^① Jaspal Rusi, “Anti-Semitism and anti-Zionism in Iran”, *Israel Affairs*, Vol. 19, No. 2, 2013, pp. 231-258.

^② Lerner Julia, “‘Russians’ in Israel as a Post-Soviet Subject: Implementing the Civilizational Repertoire”, *Israel Affairs*, Vol. 17, No. 3, 2011, pp. 21-37.

^③ Niznik Marina, “Cultural Practices and Preferences of ‘Russian’ Youth in Israel”, *Israel Affairs*, Vol. 17, No. 1, 2011, pp. 89-107.

分段划分研究对象的方法，特别是针对青年群体的研究（上文提到的菲利普·迈克尔和娜费曼·安娜也讨论了价值观延续对青年的影响），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对以色列主流价值观的接受机制。

实际上，移民研究分为移民流入与流出双向度。学者除了研究流入以色列移民的认同机制以外，还有关于犹太移民流出的类似研究。比如，科恩·伊农（Cohen Yinon）等人在《由苏联到以色列、美国和德国的犹太移民（1990~2000年）》^①一文中，运用自我选择理论（self-selection），将犹太移民到达移入地国家的教育水平作为参考指标，运用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回报正相关模型，讨论了3个国家对犹太移民的相对吸引力，指出：由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技能回报率高于以色列或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移民更有可能移居美国。双向的移民研究表明，以色列国民身份认同是国家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犹太文化对外传播的基础，因此移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和对以色列主流价值观的接受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相关。

第三，国内政治是重点研究方向。研究者对于以色列国内政治、政策的研究，一方面着眼于国内政治运行机制的研究，另一方面着眼于政策评估和政策调整。这类研究通常运用统计分析和调查访谈的定量研究方法，分析政治体制和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例如，阿奇拉夫·奥斯奈特（Akirav Osnat）在《以色列议会议题使用研究（1992~1996年）》^②一文中，从政府回应效率、有效性、补充质询、回应结果宣传四方面分析了1992至1996年间1041个议会议题，发现了第13届议会使用议题工具的效率更高，但议会议题作为控制政府的手段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科恩·尼辛（Cohen Nissim）等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调查了940人对于以色列福利国家政策的看法。他在《公众对福利国家和公共政策的态度：以色列的经验》^③一文中指出：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包括提供公共服务、支持公共投资和福利事业、提

^① Cohen Yinon, Haberfeld Yitchak and Kogan Irena, "Who Went Where? Jewish Immigration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o Israel, the USA and Germany, 1990-2000", *Israel Affairs*, Vol. 17, No. 1, 2011, pp. 7-20.

^② Akirav Osnat, "The Use of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in the Israeli Parliament, 1992-96", *Israel Affairs*, Vol. 17, No. 2, 2011, pp. 259-277.

^③ Cohen Nissim, Mizrahi Shlomo and Yuval Fany,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the Welfare State and Public Policy: the Israeli Experience", *Israel Affairs*, Vol. 17, No. 4, 2011, pp. 621-643.

供社会救助等在内的公共福利政策表示支持，但为国家提供福利政策而多缴纳税款的意愿较弱，这一调查结果也解释了过去十年以色列社会经济政策与大多数民众对福利国家预期之间的差距。

第四，巴以问题是重要研究课题。研究者以学术研究的形式考证和回应针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反犹太主义宣传等涉及巴以问题的现实关切，这类研究立场和倾向性比较明显，更多从以色列角度出发为其争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卡什·艾福瑞（Karsh Efraim）在《巴勒斯坦难民究竟几多？》^①中通过大量解密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英语文件，多方印证估算 1948 年战后巴勒斯坦难民数量，挤出其中“水分”。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政府将巴勒斯坦难民人数估算在 55 万至 60 万人之间，英国外交部估计难民数量也在 60 万左右。但由于对国际援助资金的需求，一年内在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登记的难民数量已经达到了 96.2 万。50 年后，联合国统计巴勒斯坦难民数字总数攀升到 375 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公布的难民数字更高达 500 万，而以色列政府非正式估计难民及难民家庭人数接近 200 万。费什曼·乔尔·S.（Fishman Joel S.）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反亲犹太主义化和煽动歧视的“BDS”^②信息》^③一文中指出：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不承认《奥斯陆协议》的前提，包括与以色列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或达成任何形式和解的可能性。该文批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是“将孤立和摧毁犹太国家的战略目标巧妙地隐藏在寻求正义的幌子下”，认为这是“极具危险的”。

第五，社会现实问题是重要研究关切。能源安全、网络自媒体、宗教和互联网的关系等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社会问题是以色列主题研究论文的重要关切。这类论文更多从社会现象出发，运用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社会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内在成因，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对于妥善应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巴达特·戈达特（Bahgat

^① Karsh Efraim, “How many Palestinian Arab Refugees were There?”, *Israel Affairs*, Vol. 17, No. 2, 2011, pp. 224 - 246.

^② “BDS” 全称为 “The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是一项致力于结束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并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法的全球运动，see <https://bdsmovement.net/what-is-bds>, 2018-01-29.

^③ Fishman Joel S., “The BDS Message of Anti - Zionism, Anti - Semitism, and Incitement to Discrimination”, *Israel Affairs*, Vol. 18, No. 3, 2012, pp. 412 - 425.

Gawdat) 在《以色列的能源安全: 里海和中东》^① 中分析了 1979 年以前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能源合作, 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后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能源合作, 指出能源安全受地区形势影响的不确定性, 并提出从战略合作的高度加强与里海国家的能源合作, 以保障以色列的能源安全, 弥补本国能源不足的建议。曼诺斯维奇·伊内特 (Manosevitch Idit) 在《以色列在线新闻产业新情况: 用户产生内容》^② 一文中, 关注以色列网络新闻领域用户生成内容的新情况, 通过对新闻编辑人员的访谈和对用户生成内容的案例分析, 给出了完善用户生成内容的数据搜集, 分析以色列文化在用户生成内容中的方法, 以便更精准地研究自媒体现象。坎贝尔·海蒂 (Campbell Heidi) 在《在正统犹太教语境下的以色列宗教和互联网关系》^③ 一文中指出, 互联网对以色列宗教界带来挑战。该文作者在访谈正统犹太教团体过程中发现, 虽然有许多正统犹太教团体使用互联网, 但仍有部分正统犹太教团体对互联网表示恐惧, 甚至限制使用以减少网络对宗教社会规范和权威构成的潜在威胁。该文分析了不同宗教团体解决宗教和互联网之间问题的策略, 以使以色列宗教团体更好地了解和互联网。

综上, 西方学者有关以色列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研究, 重视该国国民身份认同和民主价值观的接受, 选取建构主义视角, 从身份认同和文化融合的目的出发, 将移民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重点关注青年一代移民向以色列文化的靠近和融入, 推动其从移民身份转化为以色列国民身份。关于以色列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 研究者从加强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 对政治机制运行、网络舆论引导、宗教与互联网关系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在研究方法上, 他们更多采用实证主义方法, 综合运用深度访谈、结构化问卷调查等质性研究方法, 以及文本话语分析、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 以支撑构建模型的效度和研究结论。

(二) 土耳其国别研究: 以宗教与世俗关系为研究主线

凯末尔在建立现代土耳其之时便确定了国家世俗化发展的方向, 但宗教和世俗力量之间的博弈一直是土耳其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2008 至 2018

^① Bahgat Gawdat, "Israel's Energy Security: the Caspian Sea and the Middle East", *Israel Affairs*, Vol. 16, No. 3, 2010, pp. 406-415.

^② Manosevitch Idit,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 the Israeli Online Journalism Landscape", *Israel Affairs*, Vol. 17, No. 3, 2011, pp. 422-444.

^③ Campbell Heidi, "Religion and the Internet in the Israeli Orthodox Context", *Israel Affairs*, Vol. 17, No. 3, 2011, pp. 364-383.

年，土耳其执政党是具有伊斯兰背景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由此正发党的内政外交政策走向遂成为西方学界土耳其研究的关注点。

第一，正发党的政治治理是研究重点。正发党通过自身的转型将伊斯兰主义融入社会政治结构当中，在宗教保守势力坚持的伊斯兰主义和世俗精英坚持的新自由主义中间寻求平衡点，在此基础上团结了土耳其保守的中右翼政治力量，将政治民主化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加以推进，为长期执政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森·穆斯塔法（Sen Mustafa）在《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转型和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①一文中，以土耳其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教综合体、宗教领域的永久性扩张、新自由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结合为研究切入点，解读了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融入社会政治结构的方式，并得出结论——伊斯兰主义融入社会政治结构为正发党的崛起并执政拓展了巨大的社会政治空间。《正发党“征服”中右翼：前景及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②一文，通过反思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正义党的先例，评估了正发党实现其政治战略的前景，预测阻碍土耳其全面民主化的因素可能是中右翼有关伊斯兰教的遗留问题。塔斯肯·尤艾科索（Taskin Yucsel）指出，正发党将民粹主义作为施加政治战略影响力的手段，利用民主党的政治遗产来填补自身政治布局内中右翼的空白。

正发党在宗教保守派和世俗精英的博弈中找到平衡，获得了各方的支持，落实到具体社会政策上，则更加需要找到各派政治力量的“最大公约数”，以获取长期执政的民意基础。社会福利政策、医疗改革等涉及社会发展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观察正发党平衡各方政治力量具体举措的切入点，学者通过政策研究也能对土耳其国内社会稳定情况作出宏观判断。布格拉·艾什（Bugra Ayse）和阿达尔·塞纳姆（Adar Sinem）在《非成熟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变化研究——以土耳其为例》^③一文中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福利政策制度，其特点是强调工作福利而不是单纯福利。这种制度模式需要国家和私营企业自愿地提供社会关怀和公共服务，对欠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产生深远影响。而社会保障制度是土耳其自 20 世纪 80 年代

① Sen Mustafa, “Transformation of Turkish Islamism and the Rise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Turkish Studies*, Vol. 11, No. 1, 2010, pp. 59–84.

② Taskin Yucsel, “AKP’s Move to ‘Conquer’ the Center-right: Its Prospects and Possible Impacts o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Turkish Studies*, Vol. 9, No. 1, 2008, pp. 53–72.

③ Bugra Ayse and Adar Sinem, “Social Policy Change in Countries without Mature Welfare States: The Case of Turkey”,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38, 2008, pp. 83–106.

以来制度变迁重要的一部分，是奠定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一。随着在社会领域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提升，土耳其政府重视非政府组织对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关切与诉求，学者亦有此方面的研究著述。耶尔马兹·沃尔坎（Yilmaz Volkan）在《改变土耳其医疗保障服务不平等根源：从地位到收入》^①一文中，认为土耳其的医疗保障体系并没有实现社会各层级民众获得医疗服务机会的平等性。土耳其正发党2003年启动了健康转型计划，承诺改善民众在社会领域的不平等待遇，通过政策转型努力消除以收入差别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减少社会不平等因素给国内政治带来的潜在威胁。该文评析了正发党在医疗保障政策转型计划中应对由民众职业地位带来的享受公共医疗服务不均等现象而采取的方法：一是基于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实施全国统一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以实现公共保险的福利待遇均等化；二是取消了由民众职业地位不同带来的医疗保障服务的差异性做法。

第二，宗教力量与世俗精英的政治理念差异成为研究者突出的研究线索。虽然正发党在宗教力量和世俗精英中找到了平衡点，但是两种政治力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则有很多不同之处。世俗精英坚持西式政治民主化方向，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而宗教保守势力重视奥斯曼帝国留下的伊斯兰遗产，及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两大政治势力在理念上的不同体现在城市建设、发展模式、媒体宣传等方面。比如，卡丹·因弗·巴图（Candan Ayfer Bartu）和卡洛古·巴瑞（Kolluoglu Biray）在《新自由主义的新兴空间：伊斯坦布尔的封闭城镇与公共住房项目》^②中，以两个城市空间作为考察的样本，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推进私有化过程中，城市治理呈现出新的财富积累与贫困现象相伴而生的情况，并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以社会和空间隔离为表现形式的新城市化标志，以政治形式之间的差异解释了城市发展空间的不同。又如，豪斯格·艾福润（Hosgor Evren）在《安纳托利亚之虎：伊斯兰首都的过去与现在》^③一文中，批判性地回顾了作为“伊斯兰首都”的土耳其，采用非文化主义的叙述方式确定“伊斯兰首都”的独特标准，讨论了无息银行、

^① Yilmaz Volkan, "Changing Origins of Inequalities in access to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Turkey: From Occupational Status to Income",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48, 2013, pp. 55 - 77.

^② Candan Ayfer Bartu and Kolluoglu Biray, "Emerging spaces of neoliberalism: A Gated Town and a Public Housing Project in Istanbul",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39, 2008, pp. 5 - 46.

^③ Hosgor Evren, "Islamic Capital/Anatolian Tigers: Past and Presen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7, No. 2, 2011, pp. 343 - 360.

作坊、宗教网络和社区关联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此基础上理解伊斯兰资本的独特积累方式，这种方式又与伊斯兰文化紧密相关。研究“伊斯兰首都”的过去可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可能，也可以评估“伊斯兰首都”这一术语的解释能力。研究者采用历史角度观察宗教网络与资本结合的方式，描述“伊斯兰首都”的特性，并将其作为现代土耳其选择继承传统的发展方式之一，即突出伊斯兰特征展现出宗教保守主义对社会发展的看法。桑默·米瑞特(Somer Murat)在《媒体价值观与民主化：宗教保守派与世俗精英统一还是分裂?》^①一文中，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1996年至2004年土耳其3种宗教保守派报纸和两种亲世俗派报纸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了在宗教保守派和世俗精英两个阵营当中都存在多元化的情况，各自内部在宗教、世俗主义、社会多元化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二者对于民主存有共识，但对民主形式和具体设计这一层面仍存在分歧；出现有利于民主政治的价值观转变，但宗教保守派对社会发展仍持保守立场；世俗精英中也存在分歧、互相嘲讽的情况；而两派对库尔德问题的看法则无本质差别。宗教保守派和世俗精英在价值观上并非尖锐对立而是互有转化，各自派别中也非“铁板一块”，存在着政治价值观上的分歧。新闻媒体在两派博弈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通过搭建讨论、思考、辩争的平台，促成两派在价值观上发生转变，也就是说，媒体展现的价值观既受到政治发展的影响，又影响着政治发展。

第三，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是研究焦点。正发党上台执政后，重新审视了土耳其在中东地缘政治变化格局中的定位。以埃尔多安和时任总理达武特奥卢为核心的正发党调整了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以一种更积极作为的区域大国姿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争取在欧盟、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土耳其在地区地缘战略格局中的定位调整、在国际组织中发挥影响力的策略，以及正发党领袖个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等议题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格瑞纳·艾林·S(Gorener Aylin S.)和乌可·迈腾·S(Ucal Meltem S.)在《埃尔多安的个性和领导风格对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影响》^②一文中，分析了埃尔多安在办公室的口头表述实录，系统地描述了

^① Somer Murat, "Media Values and Democratization: What Unites and What Divides Religious - Conservative and Pro - Secular Elites?", *Turkish Studies*, Vol. 11, No. 4, 2010, pp. 555 - 577.

^② Gorener Aylin S. and Ucal Meltem S., "The Personality and Leadership Style of Recep Tayyip Erdogan: Implications fo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Studies*, Vol. 12, No. 3, 2011, pp. 357 - 381.

其个性和领导风格，认为埃尔多安已经有效地削弱了对其权力的大部分监督，其个人影响力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有显著优势，体现在土耳其对外政策走向等方面。这一研究将个人层面变量引入对外政策分析模型当中，将领导风格作为研究对象，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现实应用。耶斯提斯·米瑞特（Yesiltas Murat）在《土耳其对外政策中地缘政治视野的转变》^①一文中，以土耳其外交政策两种不同地缘政治视角为切入点，解释了不同的政治行为体如何基于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影响其在地区乃至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地位，由此来解释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走向。马弗图勒·迈尔腾（Muftuler - Bac Meltem）和格罗斯·亚波拉克（Gursoy Yaprak）在《准备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对外政策是否会走向欧洲化？》^②一文中，回顾了2005年以来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后该国与欧盟关系和国内社会政治转型的变化，重点分析了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是否朝着欧洲化的方向发展、土耳其针对哪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欧洲化的变动、对外政策欧洲化变动的主要限制因素等问题。该文从欧盟一体化背景出发，对比欧盟成员国和候选国，从土耳其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加强与北约和欧盟的合作、土耳其与中东邻国关系3个视点，考察分析了土耳其对外政策欧洲化的倾向。此外，伊吉特·阿什利（Ilgit Asli）和欧扎西斯奇-塔纳·宾那尔（Ozkececi - Taner Binnur）在《土耳其在联合国安理会：“周期性外交”与寻求全球影响》^③一文中指出，土耳其在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彰显其大国地位，并充分利用上述情势在特定问题上施加影响。该文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2010年加沙自由船队事件^④和伊朗核问题作为考察案例，研究土耳其如何利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席位提升地区乃至全球领导力等土耳其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路径。

从上述研究选题与观点可以看出，西方学者抓住了当下土耳其政治文化面临的两种力量的博弈：即宗教保守力量与世俗精英之间的对抗，这深刻地

① Yesiltas Mur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opolitical Vision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Studies*, Vol. 14, No. 4, 2013, pp. 661 - 687.

② Muftuler - Bac Meltem and Gursoy Yaprak, "Is There a Europeanization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 Addendum to the Literature on EU Candidates", *Turkish Studies*, Vol. 11, No. 3, 2010, pp. 405 - 427.

③ Ilgit Asli and Ozkececi - Taner Binnur, "Turkey at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hythmic Diplomacy' and a Quest for Global Influence",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9, No. 2, 2014, pp. 183 - 202.

④ 2010年5月31日早晨，以色列军方拦截一支驶向巴勒斯坦加沙救援船队，强行登船后立即开火，造成至少19人死亡；随后国际社会对此谴责，土耳其召回驻以大使。

影响着土耳其的内政外交走向。而土耳其正发党则在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对抗中找到了平衡点，实现了新自由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妥协与合作，其自身也因此获得了长期执政的基础，同时也实现了权力向正发党核心的高度集中。在外交领域，由于受到奥斯曼帝国历史文化延续性的影响，现代土耳其在对外政策上展现出一种大国思维和大国姿态，这一点在中东地区甚至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得较为突出，尤其是地缘政治定位、申请加入欧盟、增强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影响力等具体问题。

（三）政治发展研究：以推进民主化手段和政策评估为核心

2010 年底始自突尼斯且被西方学者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所谓民主化浪潮席卷中东多个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发生了政权更迭。直至今日，叙利亚的内战硝烟仍未熄灭。那么，如何研判中东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西方学者亦应时而需，进行了跟踪研究。

奥坦 - 奥奇·欧扎勒姆 (Altan - Olcay Ozlem) 和伊克都古·艾哈迈德 (Icdygu Ahmet) 在《中东公民社会图谱：以埃及、黎巴嫩、土耳其为例》^①一文中，从公民社会是政治自由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原点出发，以公民社会运动与国际民主建设之间的矛盾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分析埃及、黎巴嫩、土耳其三国民众社会的活动，认为公民社会组织不能发挥政权更迭催化剂的作用，它对公民整体价值观的预期影响与实际公民运动行为体的经验存在很大差距，而其他潜在力量对社会政治转型有所帮助。

阿卜杜拉赫曼·玛哈 (Abdelrahman Maha) 在《埃及左派与伊斯兰主义者间的合作》^②一文中，敏锐地发现：埃及的左翼势力、伊斯兰组织和民族主义派别属于传统的对立政治力量，三者虽在意识形态、政治主张等方面存在着结构性根本性矛盾，但仍能结成联盟，并以反对派的形式出现在埃及政坛。霍夫曼·安雅 (Hoffmann Anja) 和科尼格·克里斯托夫 (Koenig Christoph) 在《揭开民主的假面：“二·二〇”运动的战略目标》^③一文中，以 2011 年 2 月 20 日发生在摩洛哥的街头政治运动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街头政治运动

^① Altan - Olcay Ozlem and Icdygu Ahmet, "Mapping Civil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ases of Egypt, Lebanon and Turke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9, No. 2, 2012, pp. 157 - 179.

^② Abdelrahman Maha, "With the Islamists? Sometimes. With the State? Nev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Left and Islamists in Egypt",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1, 2009, pp. 37 - 54.

^③ Hoffmann Anja and Koenig Christoph, "Scratching the Democratic Facade: Framing Strategies of the 20 February Movement",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8, No. 1, 2013, pp. 1 - 22.

挑战既有政权合法性的方式，他认为“二·二〇”街头政治运动挑战了摩洛哥国王划定的政治话语红线，对政权合法性的话语权进行解构，动摇了既有政权的民意基础，颠覆政权与进行民主化改造是该运动的最终目标。特蒂·安德里亚（Teti Andrea）在《欧盟对“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反应：对共享民主与共同富裕的批判性话语分析》^①一文中指出，民主与共同繁荣之间的关系（PdSP）是“阿拉伯之春”后欧盟中东政策的新定位，这一概念是基于民主-公民-政治、社会-经济权利两种实现民主的途径而提出的，因此他建议欧盟对中东国家提供“民主援助”（Democracy Assistance）。

西方学者认为，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是中东地区民主化运动高潮的发端。关于这一运动爆发的原因和未来走向，西方学者更倾向于将其作为验证独裁-民主政体二元对立理论模型的新案例。在对“茉莉花革命”的分析过程中，西方学者发现：将独裁政体与民主政体放置在二元对立的话语环境下，对其进行能力评估和价值判断是僵化和刻板的，有些现象无法解释。中东地区民主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独裁政权”的打压，而政治反对派力量内部的分裂也是重要因素。比如，卡瓦托尔塔·弗朗西斯科（Cavatorta Francesco）和豪格波尔·李克克·霍斯特鲁普（Haugbolle Rikke Hostrup）在《突尼斯神话和本·阿里独裁统治的终结》^②一文中，回顾了本·阿里执政20年来突尼斯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的神话，并指出这些绩效掩盖了突尼斯社会的复杂性，独裁-民主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存在僵化的缺陷，研究突尼斯乃至阿拉伯政治的学者需要有整体观和微观学术视角。又如，豪格波尔和卡瓦托尔塔在《真正的突尼斯反对派会崛起吗？独裁统治下反对派联合的失败》^③一文中，提出突尼斯反对派的分裂与独裁政府的压制对民主化运动的阻碍作用是等效的。由于意识形态、战略分歧和领导人个人竞争以及反对派内部的分裂，致使反对派在“茉莉花革命”爆发之时未取得革命领导权，也提出反对独裁政府的革命存在必然性，不能夸大政治反对派的作用。

^① Teti Andrea, “The EU’s First Response to the ‘Arab Spring’: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Partnership for Democracy and Shared Prosperity”,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7, No. 3, 2012, pp. 266–284.

^② Cavatorta Francesco and Haugbolle Rikke Hostrup, “The End of Authoritarian Rule and the Mythology of Tunisia under Ben Ali”,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7, No. 2, 2012, pp. 179–195.

^③ Haugbolle Rikke Hostrup and Cavatorta Francesco, “Will the Real Tunisian Opposition Please Stand Up? Opposition Coordination Failures under Authoritarian Constraint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38, No. 3, 2011, pp. 323–34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秉持西方民主价值观,以西式民主手段来改造中东地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倡导的中东国家民主化方向,建设公民社会、推动街头政治革命、打造政治反对派是西方国家在中东推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途径。然而,这些途径在中东地区使用的实际成效与期望效果之间存在差异,出现了一些实践与理论预测相异的情况。通过比较分析中东地区“民主化”运动案例,一些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公民社会、街头政治、政治反对派等手段在中东推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有相当的局限性。

(四) 身份主题研究:以多角度认同观念分析非物质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身份主题研究的重点在于关注认同观念这种非物质因素对政治运行及政策制定的影响。以世俗化为改革方向的凯末尔主义者将“脱亚入欧”作为国家发展目标,而土耳其曾经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则难以摆脱伊斯兰文明的影响。相比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土耳其则显得格格不入。现代土耳其向世俗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全盘欧化的过程。土耳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方面对接欧盟标准,然而在文化领域全盘欧化则意味着与伊斯兰文化的割裂。由此,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在政策上转向欧化,而文化传统和社会认知仍受到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强大影响,也就造成了国家身份认同的混乱。

研究者从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两个角度来分析认同机制,认为非物质因素是土耳其在国际关系中未获信任和拥有不安全感的原因,这种情况会对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比尔因·皮纳什(Bilgin Pinar)在《土耳其安全保障:以西方外交政策为导向》^①一文中,从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对他者赋予的“外国”观念和管理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观念进行了区分,分析了西方国家对土耳其身份认识给该国国民带来的不安全感,认为这种不安全感不同于军事力量等物质性因素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但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导向上影响深刻。亚维肯·巴萨科(Yavcan Basak)在《对移民和欧盟的公众意见:土耳其移民因何如此不同?》^②一文中,将公众对外来移民和欧盟扩张两个事件的态度关联起来,研究欧洲民众对其看法。该文作者将德国作为研究对象,发现

^① Bilgin Pinar, “Securing Turkey through Western - oriented Foreign Policy”,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40, 2009, pp. 103 - 123.

^② Yavcan Basak, “Public Opinion toward Immigration and the EU: How are Turkish Immigrants Different than Others?”, *Turkish Studies*, Vol. 14, No. 1, 2013, pp. 158 - 178.

德国民众反对土耳其移民入境的态度比反对其他欧盟成员国移民的态度更为强烈。一些学者运用输入性文化差异的观点解释这种现象，而亚维肯·巴萨科以民意调查的结果说明欧洲本土民众对于欧盟扩张存有恐惧感，这是产生反欧盟主义（Euroskepticism）的重要原因，具体到对土耳其籍移民的排斥则是内生性的，是反对欧盟扩张的外化效应，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多元文化。科斯塔利·斯克凡诺（Costalli Stefano）在《海权：新古典现实主义与欧洲－地中海关系的适用性》^①一文中，认为“巴塞罗那进程”（The Barcelona Process）和“欧洲邻里政策”（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都是建构主义理论支持下的对外政策，权力和支持权力运行的逻辑对于此类政策尤为重要。在一些学者看来，对于危机四伏的地中海政治生态，应运用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来分析巴塞罗那进程和欧洲邻里政策中的观念因素，能够更好地解释当前欧洲－地中海国家间关系。

公民身份认同、对外政策制定的观念基础和理论视角都属于影响国际关系及政策制定的非物质因素，在建构主义思想者看来，非物质因素在国际关系行为体互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非物质因素能够从多层面面对国家政策产生“双向”影响：一方面，对于民众个体的认同观念研究能够帮助政府了解民众对政策的真实想法，使当政者在制定政策时能充分考虑民意基础，以期获得更多的支持，这对于依靠选举上台的领导人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一国可以通过了解他国对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的认知，寻找到与他国或国际组织对话和交往的共识平台，这既有助于推进国家间关系发展，也有利于营造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环境。

研究主题的时序变化

前文在共时性层面以关键词聚类的方式，对“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东研究期刊论文进行解读和分析，在历时层面呈现出围绕同一研究主题的论文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集中出现，以及引文关系上的相关性。为了更好地观察研究主题的时序性变化，保持时间切片、“g-index”的提取算法和寻径算法不

^① Costalli Stefano, “Power over the Sea: The Relevance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to Euro－Mediterranean Relation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4, No. 3, 2009, pp. 323－342.

变，将可视化图谱选择时间轴视图模式（timeline view）（图3）。软件根据论文的关键词和引文的共现关系自动找出11个聚类，同一聚类的论文被放置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论文发表时间位于图谱最上方，从左至右依次递增。水平线的实线长度代表该聚类研究的时间跨度，也就是该聚类主题研究兴起、繁荣和衰落的过程。水平线上的节点表示同一关键词，节点半径大小代表该研究主题论文数量的多少，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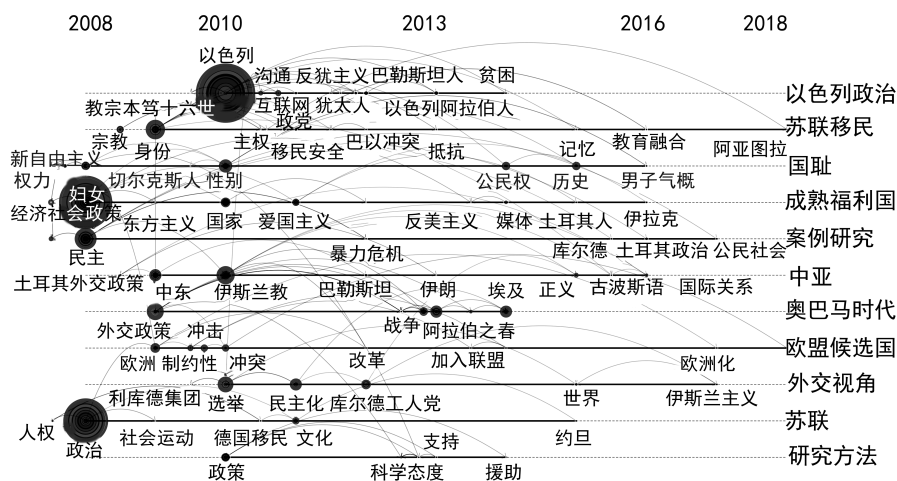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东研究期刊论文关键词聚类时间轴图谱

（一）以色列国家权利及其合法性的理论建构（2010~2012年）

2010~2012年，学者围绕着以色列的国家权利及其合法性的研究相对集中，在理论上论证了巴以和谈失败和冲突升级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以色列的国家权利及其合法性是以方在和谈中的核心关切，也是和谈成功的前提。而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并无意愿和能力承认由单一犹太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以色列，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一直存在于中东地区。以色列认为这种对犹太民族权利的无视和侵害，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例如，科恩·劳埃德（Cohen Lloyd）在《巴以谈判中丢失的筹码》^①一文中指出，巴以和谈成功的前提是阿拉伯人必须有意愿和能力承认以色列的国家权利，才能得到以色列对其国家主权的尊重。而现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还无法成为这个和谈的“筹

^① Cohen Lloyd, “The Missing Currency of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Israel Affairs*, Vol. 16, No. 3, 2010, pp. 455-465.

码”。劳埃德提出，以色列国家权利对巴以和谈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卡什·埃弗瑞姆（Karsh Efraim）在《对犹太人的战争》^①一文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阐发为，反犹太主义就是剥夺犹太民族自决的权利。格罗斯·阿农（Gross Arnon）在《巴勒斯坦教科书对以色列合法性的消解》^②一文中，对比了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的教科书，发现了其中对于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的消极立场，即便是埃及、巴解组织、约旦等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国家或组织，在它们的教科书中仍然没有改变这种立场。泊勒·尼德拉（Poller Nidra）在《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攻击意图》^③一文中，将以色列的国家权利、反犹太主义和种族灭绝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理论逻辑。他认为反犹太主义是对犹太民族权利的剥夺，是种族主义的表现，对于以色列的严厉批评以及希望通过和谈方式改变地缘政治环境的做法都是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手段，而以色列作为“自由世界”的堡垒应该得到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二）解决巴以冲突的谈判模型（2012年）

几十年的矛盾积累和巴以居民犬牙交错式的分布，大大增加了解决巴以冲突的难度。在完成以色列国家权利及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建构后，西方学者提出“MOPE”（The Minds of Peace Experiment）谈判模型，并根据该模型分析后提出搁置历史积怨，强调尊重巴以双方的意愿和现有人口分布情况，从现实需求出发以缓和冲突实现和平为目标，在冲突地区的基层展开对话谈判，采取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谈判模型设计，将巴以冲突“化整为零”，从政治地理的角度逐个解决冲突地区矛盾，达到减小冲突规模和烈度的目的。莱维·塔尔（Levy Tal）在《政治地理与基层冲突解决》^④一文中，重点分析了政治精英提出的“MOPE”谈判模型的内在机理，认为它是克服破解谈判困境、推动冲突解决的有益尝试。卡恩·阿农（Cahen Arnon）在《“MOPE”：基层冲突解决法》^⑤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该模型的性质、目标和程序，评估了

① Karsh Efraim,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Israel Affairs*, Vol. 18, No. 3, 2012, pp. 319–343.

② Gross Arnon, “De-legitimization of Israel in Palestinian Authority Schoolbooks”, *Israel Affairs*, Vol. 18, No. 3, 2012, pp. 455–484.

③ Poller Nidra, “Attacking Israel with Genocidal Intentions”, *Israel Affairs*, Vol. 18, No. 3, 2012, pp. 363–371.

④ Levy Tal,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Grassroots Conflict Resolution”, *Israel Affairs*, Vol. 18, No. 1, 2012, pp. 140–153.

⑤ Cahen Arnon, “The Minds of Peace Experiment: Conflict Resolution From the Ground up”, *Israel Affairs*, Vol. 18, No. 1, 2012, pp. 88–106.

该模型影响冲突的能力和应用在巴以基层对话中的适应性。巴以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冲突的利益攸关方有哪些？冲突方的基本诉求是什么？唯有厘清上述问题，恐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三）经济自由化带来的阶级分层研究（2010 ~ 2012 年）

选择经济自由化发展路径的中东国家，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了深刻的政治、社会阶层的变化，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不同阶级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的变动趋势。经济自由化的推进导致财富迅速向资本集团和政治寡头聚集，加速了社会底层民众的贫穷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也催生了中产阶级。在中东，经济自由化发展给中东国家带来了包括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重大影响，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格科瓦里·沃汉（Gokovali Ummuhan）和丹妮斯曼·艾素（Danisman Aysun）注意到土耳其女性贫穷化的问题。在《土耳其真的存在女性贫穷化吗？》^①一文中，作者运用计量经济学等研究方法，通过对比男、女在家庭预算调查中的数据，证实了土耳其确实存在女性贫穷化的现象，并认为其主要致因是社会、经济、人口等因素。唐纳·亨利克（Donner Henrike）关注到在城市化进程中带来更多中产阶级的出现。他在《究竟是谁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想象力与 21 世纪加尔各答的城市重建》^②一文中指出，中产阶级通过市场语言重新定义了自身的社会关系。安金·梅里（Angin Merih）和贝蒂汗格鲁·皮尔（Bedirhanoglu Pinar）在《意识形态时刻：2000 年开始的土耳其大型国企私有化的障碍》^③一文中，将土耳其 4 家特大型国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这些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面临的阻力，认为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也牵扯到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各种政治压力集团在意识形态也展开了激烈交锋，促进国内阶级分化。

（四）土耳其国民身份的认同危机（2010 ~ 2015 年）

国民身份的内涵对于国家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于国民身份的叙述随着国家发展一直不断地传承下去，任何缺失和中断都会

① Gokovali Ummuhan and Danisman Aysun,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Does it Really Exist in Turkey?",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42, 2010, pp. 179 - 201.

② Donner Henrike, "Whose City Is It Anyway? Middle Class Imagination and Urban Restructuring in Twenty - first Century Kolkata",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46, 2012, pp. 129 - 155.

③ Angin Merih and Bedirhanoglu Pinar, "Privatization Processes as Ideological Moments: The Block Sales of Large - scale State Enterprises in Turkey in the 2000s",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47, 2012, pp. 139 - 167.

造成国民身份认同的混乱。作为国民身份的重要内容，身份属性和归属标记一方面会因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被削弱，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政治、文化等影响方式得到增强。对于一直以来坚持世俗化发展方向的土耳其，国民身份认同受到宗教的影响，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时如何增强在海外侨居的土耳其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也引发了学者的思考和研究。怀特·珍妮（White Jenny）在《对土耳其国家想象力的恐惧和厌恶》^①一文中，提出要警惕国民身份意识的消失，包括对国民身份的遗忘和对其内涵阐发的中断。文章从影响国民身份的因素入手，分析了以传教士和头巾作为隐喻的宗教因素对国民身份的威胁。司麦慈·凯文（Smets Kevin）研究了政治电影如何影响海外侨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在《跨国的“土耳其兰博”：在比利时的土耳其移民对主流政治电影的分层接受研究》^②一文中，以电影《狼谷》为例，通过对安特卫普社区居民的深度访谈，分析了《狼谷》是如何将地缘政治因素融入其中，并如何影响侨民的身份认同的。作者研究发现：侨民对于电影中地缘政治因素暗示的国民身份认同呈现极度的两极分化的态度。巴尔达奇·穆罕默德（Bardakci Mehmet）关注到土耳其正发党在处理阿莱维地区问题上因受制于宗教因素影响而采取过于软弱的态度，在《阿莱维倡议：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民主和认同之间走钢丝》^③一文中，他指出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法学派已经将其对伊斯兰教的阐释融入国家和社会当中，并且已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因此在处理阿莱维问题上，土耳其正发党政府不愿得罪哈乃斐派选民，显示出软弱的态度。由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安排，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在国民身份和选民选票中小心地寻求平衡，成为彻底解决阿莱维问题的障碍。

（五）土耳其的社会排斥与贫困阶层（2008年）

土耳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和贫困阶层的原因主要如下：一是政策制度设计造成的不公平使得低收入群体负担过重，引发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二是社会经济的不均衡加剧了贫富差距，社

^① White Jenny,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Turkish National Imagina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42, 2010, pp. 215-236.

^② Smets Kevin, "Turkish Rambo Going Transnational: The Polarized Reception of Mainstream Political Cinema among the Turkish Diaspora in Belgium", *Turkish Studies*, Vol. 15, No. 1, 2014, pp. 12-28.

^③ Bardakci Mehmet, "The Alevi Opening of the AKP Government in Turkey: Walking a Tightrope between Democracy and Identity", *Turkish Studies*, Vol. 16, No. 3, 2015, pp. 349-370.

会排斥在现实空间中呈现为“永久放逐空间”（perpetual spaces of relegation）。隐性的社会排斥最终形成了显性的“永久放逐空间”，构成贫困阶层的人群迁移到城市谋求生路。格克森·法托斯（Goeksen Fatos）等人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定量分析了土耳其统计研究所（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公布的 2003 年家庭消费调查中交税情况，对土耳其不同地区居民对税制的公平性、透明度等方面态度进行深度访谈，将质性研究结果与数据分析结果对比得出结论，土耳其现行税制将加剧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作者在《税收制度对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影响研究——以土耳其为例》^①一文中指出，土耳其现行税制严重依赖消费退税，低收入群体支付间接税比例过高，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南部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已无力交税；不公平的税制、政府公共服务的退化以及腐败现象进一步降低了贫困群体交税的意愿和对政府的信任。耶尔马兹·贝迪兹（Yilmaz Bediz）从贫困和排斥两个核心概念出发，观察到隐性的社会排斥导致显性的“永久放逐空间”，形成了贫困阶层的空间固化形态。在《陷入多方面的排斥：伊斯坦布尔移民聚居区的永久贫困》^②一文中，作者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分析了社会排斥现象。在上述各因素相互叠加的作用下，伊斯坦布尔内城区的贫民窟成为城市贫民的“永久放逐空间”，而库尔德移民则是这一贫困群体的主要来源。社会排斥将加剧两极分化，伊斯坦布尔的内城移民聚居区的贫困状况将长期存在。

（六）国际关系理论在中东的反思和实践创新（2013 ~ 2016 年）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东研究论文的作者从宗教因素出发，在思想层面寻找伊斯兰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内在的关联性，并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阐释中东国家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以及国家形象建构方式，发现中东国家在国际体系互动中的特殊性。比如，巴迪·萨米（Baroudi Sami E）选取了谢赫·优素福·卡拉达维（Sheikh Yusuf Qaradawi）和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Sayyid Mohammad Hussein Fadlallah）两位伊斯兰思想家作为研

^① Goeksen Fatos, Oezertan Goekhan, Saglam Ismail and Zenginobuz Uenal, “Impacts of the Tax System on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A Case Study on Turkey”,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38, 2008, pp. 159 - 179.

^② Yilmaz Bediz, “Entrapped in Multidimensional Exclusion: The Perpetuation of Poverty among Conflict - induced Migrants in an Istanbul Neighborhood”,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38, 2008, pp. 205 - 234.

研究对象,在《伊斯兰现实主义思想研究》^①一文中,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核心假定出发,将出自《古兰经》的相互制约的法则与现实主义权力平衡理论相比较,对比伊斯兰教宗教思想、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强调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宗教思想来源,得出现实主义不应该被视为西方经验和世俗思想的产物,而应该被视为超越文化边界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式的结论。伊匹克·沃尔卡恩(Ipek Volkan)和比尔特金·刚卡(Biltekin Gonca)在《土耳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外交政策的执行:非国家方式》^②一文中,将土耳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土耳其对该地区的外交政策。作者指出,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文件中未系统阐述该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而实际上以土耳其的商界和民间组织为依托,开展与该地区的交往与合作;土耳其选择非国家行为体推动双方关系,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政治行为体,符合当下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变化。阿卡恩·泽恩普(Arkan Zeynep)和肯纳齐奥卢·马格(Kinacioglu Muege)运用批判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达武特奥卢的对外政策,在《雄心勃勃的行动主义者:达武特奥卢的土耳其对外政策新定位》^③一文中指出,达武特奥卢对土耳其国家历史和地理位置重新解读,将其塑造为特定群体的全球代表,以外交话语建构方式重塑土耳其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形象,明确了其国际角色及其国际责任。

研究主题的时序变化是主题聚类上的另一种展现形式,两者聚类的网络关系是一致的,时间轴视图和关键词视图是从两个维度来观察同一网络。^④时序变化的特点与研究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势密切相关,也与期刊定位和选题导向有关。一般说来,期刊论文研究主题的变化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期刊在一段时间内围绕某一主题开设专栏征集稿件,从多角度深入分析该主题,以期推进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深度;另一方面,某一主题引发了学者的研究兴趣,由此期刊上出现了不同作者渐进式研究

^① Baroudi Sami E, "The Islamic Realism of Sheikh Yusuf Qaradawi (1926 -) and Sayyid Mohammad Hussein Fadlallah (1935 - 2010)",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1, 2016, pp. 94 - 114.

^② Ipek Volkan and Biltekin Gonca,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 Post-international Approach",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49, 2013, pp. 121 - 156.

^③ Arkan Zeynep and Kinacioglu Muege, "Enabling 'Ambitious Activism': Davutolu's Vision of a New Foreign Policy Identity for Turkey", *Turkish Studies*, Vol. 17, No. 3, 2016, pp. 381 - 405.

^④ 笔者认为空间引文图谱是一个高维度空间结构(四维至五维),本文中的图谱是以选定维度展示的二维图谱。

或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在英国主办的《以色列研究》明显是为以色列争取国家权利、推动巴以问题朝着有利于以方的方向发展提供学术发声的平台，承认以色列国家权利是保证以方在巴以和谈中利益的前提，西方学者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以色列的合法权利，给反犹太主义贴上了“种族灭绝”的标签，其中的立场和指向是很明确的，而“MOPE”模型则是学者在技术层面上为推动巴以和谈所做的努力。先明确谈判前提再提供推动谈判技术模型，是这两个聚类时序变化的内在机理。而在土耳其主办的《土耳其的新视角》聚焦国内经济变革带来的社会发展问题，2003 年正发党上台执政后，埃尔多安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方针全面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明显加快了全面私有化进程，虽然在较短时间内减少财政赤字拉动经济增长，但加剧了土耳其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多领域的社会排斥叠加产生了城市空间中的绝对贫困阶层和贫民窟，经济自由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显现为城市按照收入差距形成的地理空间区隔。而经济自由化不仅带来了经济权利和地理空间的分层，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文化对土耳其民众传统观念的冲击，以国际文化为标榜的西方文化成为社会精英追捧的对象，与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割裂造成了国家身份认同的危机。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工具，给土耳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带来了深刻影响，影响的层次从物质层面的社会分层深入到精神层面的国家认同，这就是研究主题时序变化的内在机理。

结 语

由于西方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和研究范式的限制，很多非英语语种的中东研究学术期刊并未被收录到“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目录当中，事实上，除了以英语为主要语种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目录外，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有很多高质量的中东研究刊物并未被纳入其中，因此分析样本的来源决定分析结果只能代表西方学术标准下的中东研究领域的趋势和走向。

第一，从研究选题看，“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东研究期刊论文更多关注民主化、选举、政党政治、外交政策等宏观理论研究，其成果数量多于针对“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等地区突发性事件的追踪研究。我们由此可以看

出国际中东研究领域对阐释和评估中东政治的“宏理论”（Grand Theory）研究热情较高，即便对于“阿拉伯之春”这样对地区形势带来巨大影响的突发性事件的研究，也将其放置在政治体制变革、政治发展模式等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和考察。此外，在名词性术语图谱当中，“奥斯曼帝国”“19世纪”“21世纪”这些关键词说明国际中东研究的历史跨度较大，也是为提出、验证、完善“宏理论”提供可置信的理论效度空间。

当然，西方学界历来有微观国别研究传统，“土耳其”和“以色列”是高频次出现的中东国别研究关键词。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中东研究领域期刊存在系统性缺陷。我们统计梳理3139篇论文第一作者和论文所属研究机构发现，除了土耳其、以色列、伊朗、黎巴嫩外，作者集中分布在西方国家，研究机构集中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西方国家作者刊发论文数量占统计样本的59.19%，如果将以色列计入在内，西方国家作者发表论文数量则占总量的73.23%。如前所述，这一现象与期刊样本选取（未收录在阿拉伯国家创办的中东研究类期刊）有关，致使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学术评价体系内阿拉伯国家研究力量的“集体失声”。阿拉伯国家在中东地区领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是中东最重要的地区事务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阿拉伯国家中东研究领域期刊未被收录进“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一现象反映出“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评价体系的缺陷性，也说明美国通过学术评价体系的建设和非西方的研究排除在外，维护和强化学术垄断地位。

第二，研究观点彰显西方学者对于中东现实问题研究的普世“改造”情结。从民主化、公民社会、社会运动等研究热点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东研究论文中带有强烈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不仅体现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工具上，而且在论文中表现出“改造”中东地区的强烈意愿。西方学者从威权—民主政体的二元对立逻辑出发，将“阿拉伯之春”视为对中东国家“民主改造”的机遇^①，充分讨论了公民社会、街头政治运动、打造政治反对派等“民主改造”手段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对中东国家的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提供实践模型。除了研究推动“民主改革”的具体方式外，也

^① 1916年爆发的反对奥斯曼帝国、争取民族独立的阿拉伯大起义被称为“Arab Uprising”，“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西方学者曾使用“Arab Uprising”或“Arab Uprisings”的提法来描述这一社会运动，由此种命名方式可见西方学者将“阿拉伯之春”视为同阿拉伯大起义一样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重大事件，“Arab Spring”的提法出现后逐渐被使用。

有在中东地区推行政治民主化、建立选举制度、推动政党政治等民主政体建设的宏观设计，将世俗精英阶层、政治反对派作为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描述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出路，将中东地区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描述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思想。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优越性的描述对中东世俗精英阶层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使他们中的部分人放弃了从本土角度探索非西方道路的意愿和可能性，也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在学术话语体系的表现。这种以“居高临下”的视角审视和“改造”中东的研究取向，存在着先天性不足和内生性缺陷。

第三，从研究理论工具看，西方学者大多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色彩。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理论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主要的理论工具。从研究议题热点来看，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俄罗斯撤军属于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学派关心的问题；民主化、冲突解决方式属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派关心的问题；而身份认同、文化偏好则属于建构主义学派关心的问题。但“国际关系是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情境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扎根于欧洲和西方的战争、政治和经济实践，并非全知全能”^①，面对宗教文化背景复杂的中东地区难免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由此，西方学者对于伊斯兰文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和反思，也局限于对经典理论的验证和修补，仍旧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在理论工具的使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融入了权力意识，站在西方看中东的研究难免贴上了“西优东劣”的文化标签，透露出西方文化霸权理念。事实上，中东研究应强化“本土情怀”：站在中东的角度看中东。^②

第四，从研究范式看，分工协作的程式化研究方法较多见。“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东研究期刊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程式化和同一性特点。研究者在定量研究方法上，更多运用统计分析和回归模型描述研究对象；在样本划定、对照选择、数据分层与识别方面，则更多依靠统计数据搜集和分析软件的应用，增强了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分析可信度，能更为精确地计算模型和结论的效度。在定性研究方法上，质性研究和案例研究的运用可更加细致地划定研究对象分层，适用于社会认同、公民身份等数据统计办法无法测

① 程亚文、王义桅：《天命 一个领导型国家的诞生》，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

② 王泰：《文明视野下的中东与复杂多元的“交往”——中国特色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术体系构建议》，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第145页。

量或测不准的研究对象，能够在操作上以最小样本达到“理论类属饱和”^①。以统计分析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技术和以调查访谈为基础的质性研究，都属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接受度和普及度较高的程式化方法。定量研究技术是实证主义思想的产物，而定性研究技术则是行为主义思想的结果，“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东研究领域论文两种方法（包括形式方法和博弈论）交叉使用情况较多，两种高度程式化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具体问题上趋于同一性。此外，基于民意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源于田野调查的质性研究，都需要一定数量掌握专业技术的研究人员参与分析对比，客观上促进了科研分工与协作，从论文作者数量上也能反映出这一情况。^②

当下，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与争夺日趋激烈，而美国编制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权威期刊引文数据库”期刊评价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国际学术话语权，并输送着西方意识形态，也是我们观察西方学者中东研究动态的重要平台。在中国学术研究“与世界接轨”的进程中，需要中国建设一批有国际话语权的学术期刊，体现国内学界对中东研究的“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与此同时，对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东研究领域期刊论文的使用和借鉴，应该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③的立场：“不忘本来”就是要坚持从中东看中东、从中国看中东、从世界看中东的视角，充分考虑中东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从中东国家实际出发以合作共赢的人文理念为导向，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话语体系；“吸收外来”就是要充分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最新的研究方法，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学习西方中东研究中的有益成分，既包括以数据模型和形式方法为主要技术的定量研究方法，也包括以扎根理论和民族志为主要技术的质性研究方法，向一手资料和一线田野贴近，提高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面向未来”就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着眼于“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落实，不断推动中国特色中东研究体系向前发展，开创新时代中东研究的中国学派。

① 当搜集新鲜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时，也不能解释核心理论类属新的属性时，类属就“饱和”了。参见 [美国] 凯西·卡麦兹：《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边国英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

② 本文所列举的论文中，除了常见的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共同署名外，第三、四名作者同时在一篇论文上署名的情况也很多见。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Visual Analysis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Based o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hao Yuzhuo & Luo Lin

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2008 – 2018), 3 139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by 11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contained in the SSCI. Analysing the above study samples and presenting them visually by the scientific measurement software CiteSpac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esearch themes focus on country case studies of Israel and Turkey, with subjects on political theories such as political system, democracy, and identity; In the time – series changes in research hotspots, there are not only practical research such as legitimacy of Israel, Turk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reats, but also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ntrospe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However, SSCI journal articles of Middle Eastern research have congenital defects and endogenous defects, which reflect Western – centric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selection of theoretical tools, and show superiority of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with obvious cultural hegemony and strong desire to transform the Middle – East. In term of methodology, it tends to be stylised and identical in the cross –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competition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 we must not only see the essence of SSCI’s Western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but also adopt an inclusive attitude to learn from the beneficial components of Western research of the Middle – East, in order to build a discourse system and academic system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Academic Discours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CiteSpace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安春英)